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The Logic of Living with the Hegemony

潘忠岐 著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The Logic of Living with the Hegemony

潘忠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潘忠岐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09141 - 2

I. ①与… II. ①潘… III. ①霸权主义—研究—美国
②国家安全—研究—世界 IV. ①D771.20②D8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0395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毛 淳 夏 芳

与霸权相处的逻辑

潘忠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 338,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141 - 2/D · 1694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美国战略制定与调整的逻辑	5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及其构成要素	5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逻辑机理	8
第三节 建国初期美国的战略定位	12
第四节 “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失败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尝试	15
第五节 “二战”后联合国的成功与美国战略转向的实现	18
小 结 从国内与国际变量的互动看美国的战略制定与调整	22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与模式选择	23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战略修订的不确定性	23
第二节 美国战略模式与思想基础的一般比照	27
第三节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大战略	29
第四节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大战略	32
第五节 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大战略	35
小 结 从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看美国的战略选择	38
第三章 冷战后中美安全互动的主体性结构	41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互动的主体性结构	41
第二节 冷战后中美对安全目标的设定	48
第三节 冷战后中美对安全威胁的认知	55
第四节 冷战后中美对安全手段的设计	61

小 结 从战略互动的主体性结构审视中美安全关系	66
第四章 老布什政府的“领导地位”战略与中美安全关系	68
第一节 老布什政府的战略调整	68
第二节 美国的“领导地位”战略	76
第三节 老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安全互动	86
小 结 中美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	96
第五章 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与中美安全关系	98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的战略调整	98
第二节 美国的“参与和扩展”战略	108
第三节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中美安全互动	120
小 结 中美从战略方向的迷失到伙伴关系的回归	132
第六章 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安全关系	134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的战略调整	134
第二节 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	146
第三节 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中美安全互动	157
小 结 中美从短暂的战略对抗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	170
第七章 奥巴马政府的“重振领导地位”战略与中美安全关系	172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	172
第二节 美国的“重振领导地位”战略	183
第三节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安全互动	195
小 结 中美从谨慎的战略合作到试探新的战略定位	207
第八章 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困境	209
第一节 战略盲目: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再到金融危机	209
第二节 实力与安全的背离:“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 论的神话	216
第三节 案例分析:小布什政府的新中东战略及其内在困境	224

小 结 美国霸权战略能否在目标设定、威胁认知与手段选择之间 实现调和?	235
第九章 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结构特征、战略基础与台湾困境	238
第一节 中美安全关系的结构特征	238
第二节 战略基础与中美安全关系的根本难题	242
第三节 台湾困境:美国插手台湾问题	246
第四节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及其两难	252
小 结 中美如何在战略互动中改善双边安全关系的结构?	262
第十章 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中的中美安全关系	265
第一节 冷战后亚洲地区主义的兴起与美国霸权战略	265
第二节 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的变革及其特征	272
第三节 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内在动力	277
第四节 中美安全关系与冷战后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发展走向	283
小 结 中美如何在亚太地区秩序中共处?	289
结 语 学会如何与美国霸权相处	291
参考文献	298

导 言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在较短的时期内已经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使之摆脱变幻不定、摇摆动荡的历史魔咒?这一直是牵动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敏感神经的战略性问题。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不可不察。这不仅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因为中美之间在利益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纠葛。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藉此中国才能在不改变现行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情况下全面提升国际地位。

而要厘清中美关系,就必须集中研究其中的核心层面,即中美安全关系。安全关系是主导中美关系的基轴。很大程度上,中美安全关系决定中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性质与特征。中美之间只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把苏联确认为共同威胁、明确了安全关系之后,才顺利建交,使两国关系得以全面发展。接下来的问题是,中美安全关系发展变化的逻辑机理是什么?如何才能为维持中美安全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出建设性的长期方略?

从中国的角度看,研究中美安全关系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涉及中国应如何与美国霸权相处。^①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确立了较为持久的全球霸权地位。出于霸权护持的需要,美国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对其战略地位构成挑战或威胁。因此,如何与美国霸权相处,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2012 年是中美签订《上海公报》四十周年和《八·一七公报》三十周年。此时回顾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内在逻辑,对于我们更好

① Qingguo Jia, 2005,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U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pp. 395—407.

地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中美安全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学会与霸权相处,从战略高度把握和处理中美安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中美安全关系,探讨如何与美国霸权相处,需要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和中美战略互动的角度进行。早在1981年,邓小平就强调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他指出:“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①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两国都没有把中美安全关系仅仅当作一种单纯的双边关系的一个层面来处理,而是把它作为各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中美两国都把对方看作影响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考虑因素,都在制定和调整各自国家安全战略时从中美这对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安全关系的角度思考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国家安全威胁的界定和国家安全手段的选择。因此,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考察中美安全关系不仅是一个合理的视角,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和恰当的视角。

审视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演进历程,既可以从美国政府更迭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进行。相较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中美安全关系的影响远比中国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要大。有学者指出的,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总体上一直延续着大致相似的政策,都是以促进国家财富和能力建设、维护领土完整和实现祖国统一、加强党的领导、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为基本宗旨的。^②“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比较稳定。”^③但美国政府的定期更替往往或多或少伴随着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已经经历了从老布什政府一届任期,克林顿政府两届任期,到小布什政府两届任期的发展变化。奥巴马政府即将结束其第一任期。美国各届政府分别在各自任期内根据美国的实力与地位、利益与价值观,以及国际安全格局的转变,提出了各自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④并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安全关系进行了不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1—192页。

② Robert Sut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36.

③ 陈东晓:《“复杂性”与中美关系结构的新变化》,《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④ 潘忠岐:《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调整》,《社会科学》(沪)2005年第4期。

同的战略定位。因此,从美国政府变更和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角度考察中美安全关系似乎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其演进中的变化、特点和趋势。

但是,即便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同一届政府在不同任期,甚至同一任期内,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未必是对应的。因此,考察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必须从两国安全战略的互动出发。为此,笔者尝试从战略互动的视角,构建一个以中美战略互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以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变迁为主线,辅以中国对美安全政策的调整,根据中美两国在不同阶段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不同确认、安全威胁的不同界定和安全手段的不同选择,考察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从结构性战略互动角度回溯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演变,目的不在于解决中美之间的战略定位问题,而在于探讨中美安全关系不确定性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特点与趋势,研究中美安全关系的根本难题,为中国更好地与美国霸权相处提出一些战略性的思考。

理解中美安全关系需要从理解两国的安全利益入手,包括中美两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各自对安全利益的确认、对安全威胁的界定及对安全手段的选择,它们一并构成中美安全互动的基本结构。^①安全关系归根结底是安全利益关系。根据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分析,“国家利益概念预先假定,所有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既不会造就一个自然和谐与和平的世界,也不会必然导致战争。恰恰相反,这个概念假定,通过外交活动不断调整相互冲突的利益,就可以把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②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就是在外交或战争的基础上调和和解决国家间利益关系的过程。同理,中美安全关系就是在外交(如乒乓外交)和战争(如朝鲜战争)的基础上调和和解决两国安全利益关系的过程。

理解中美安全互动需要从理解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入手。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排序和战略设计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要素是一一对应的。国家安全利益确认解决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问题;国家安全利益排序解决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威胁问题;国家安全利益战略设计解决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手段问题。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就是国家安全利益的互动,因此

① 潘忠岐:《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

② Hans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 December 1952, pp. 961—988.

也就是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中美安全互动就是中美战略互动。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直接决定中美安全关系。中美安全关系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更主要的是,中美都把处理两国安全关系看作其制定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解中美战略互动尤其需要从理解美国战略制定与调整的逻辑入手。相比而言,美国的安全战略对于中美安全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基本上就是其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的延伸和应用。因此,研究中美安全关系尤其需要弄清美国制定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逻辑。要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国家安全战略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将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影响美国制定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变量主要是“国际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威胁格局的变化”;影响美国大战略的国内变量主要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美国的安全战略就是国际与国际变量互动的结果。正如王缉思指出的,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政策和思想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从美国国内寻找”。^①笔者在考察冷战后美国的战略调整时将侧重从美国国内的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进行。

鉴此,笔者首先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要素、美国制定和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在逻辑,以及中美安全互动的主体性结构几方面,构建一个研究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分析框架。这构成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接下来,笔者按照这一分析框架,从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的角度,探讨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调整;从战略目标、战略威胁和战略手段三个方面,探讨冷战后美国几届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内涵;从安全目标的界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安全手段的选择三个层次,探讨冷战后中美安全互动的具体情形。这构成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第三部分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要素出发,分析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内在困境;从中美安全互动主体性结构的三个层次出发,总结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结构特征,重点分析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与台湾困境。最后在结论部分,基于上述分析,笔者尝试就如何与美国霸权相处提出一些长远性的建议。

①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第一章 美国战略制定与调整的逻辑

美国国际战略的拟定、调整和演变是多种国际和国内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因素来看,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威胁格局是决定美国国际战略调整取向的重要变量。从国内因素来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是影响美国战略调整的重要变量。美国在建国初期和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国际战略做出的基本定位或重大调整,是考察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如何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关联并互动的重要时期。国内变量与国际变量互动的规律和模式,则为我们把握美国对外战略制定与调整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及其构成要素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资源、应对核心挑战与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价值观的总体构想。一般而言,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何在?对这些安全利益的威胁与挑战是什么?如何才能最佳运用国家的各种战略资源消除威胁、维护国家安全?^①由于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涉及国家生存的安全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优于国家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或文化战略的国家大战略。

虽然国家安全战略的三要素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国家主体性的不同和所处时代的差异,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解决国家安全

① 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 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 86—124.

问题的战略构想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体性和时代性特征,它们具体表现在某一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具体确认、对安全威胁的具体认知和对安全手段的具体设计三个方面。

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既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认知过程。从客观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安全利益源于内在的“先天性”“给定条件”^①和外在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②从主观认知的角度来看,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主体性特质是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确认的重要方面。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外客观条件只有通过主体的思维过滤之后才能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基础。例如,恐怖主义活动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客观现实对国家安全起到了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不论国家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当国家真正有了意识之后,反恐才可能成为国家安全利益。而在反恐被确认为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国民的文化习俗、惯例和传统都是不可忽视的中介因素。正如对国家利益概念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所指出的,政治家“对国家利益的解释,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及作为决策者而获得的各种信息的综合结果。”^③不仅如此,即使反恐被世界各国普遍确认为国家安全利益,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国家安全利益的领悟和理解也是各有特色的。这与各国具体国情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不无关联。

国家安全利益是多元的,不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存在轻重缓急之分。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优先排序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它们对国家安全利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具有不同的判断和认定。例如,恐怖主义在“9·11”事件中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最直接的严重威胁。虽然世界很多国家也跟美国一样把恐怖主义列为国家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把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袭击看作自己的重要国家安全利益,但是恐怖主义对于不同国家的威胁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袭击在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排序中的位置也是有差异的。即便对于美国单一国家而言,它在“9·11”事件前后对恐怖主义威胁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定也构成了鲜明对比。

①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54页。

② 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③ 转引自〔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利益排序中的轻重和缓急并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即重要利益不一定优先解决。卡特尔(Ashton Carter)和佩里(William Perry)曾经把美国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分为三类:A类是决定国家生存的威胁,如冷战期间的苏联;B类是对国家利益构成直接损害的紧迫威胁,如伊拉克;C类是对美国安全构成间接影响的威胁,如科索沃、波斯尼亚、索马里、卢旺达和海地。^①虽然从威胁的严重程度来看,从A到B到C的先后排序顺理成章,但是在实际的外交工作中,处理C类威胁反而占据了美国的主要议事日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A类威胁是长期性的、战略性的,而C类威胁是现实性的、紧迫性的,前者决定国家利益排序中的轻重,后者则决定国家利益排序中的缓急。但二者并不矛盾,C类威胁的处理一定在有利于或者至少不会影响A类威胁的解决时,才会在国家利益的排序中占先。

与国家安全利益的确认和排序相似,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设计也是见仁见智的。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设计既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地位有关,也与国家独特的价值观和战略意图相连。从实力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强国由于受制因素较少而往往倾向于设计比较灵活和进攻性的战略以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相对而言,弱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设计则常常因为存在太多受制因素而缺乏强国那样的灵活性和进攻性。从价值观和意图的角度来看,基于对现有国际体系、规范和制度与本国国家利益之间和谐程度的判断,有的国家可能选择维持现状的战略,有的则可能选择挑战或修正现状的战略。“9·11”事件后,在反恐问题上,美国自恃无可比拟的超强实力设计了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选择了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美国先是通过多边合作和联合国授权领导国际联盟发动了针对基地组织和塔里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但随后不久又在单边行动和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领导意愿联盟发动了针对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从喀布尔到巴格达,美国反恐战略的调整不仅体现了多变性,而且加强了进攻性,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范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威胁的认知和战略手段的设计是构成任何一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要素,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美国几乎排他性地认为本国面临的战略威胁来自国外,而不是来自国

^① Ashton Carter and William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9, p. 11.

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的国际战略是一致的。换言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因此笔者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使用。这与其他国家如中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中国的大战略首先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而美国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却无需考虑国土统一问题,也不必担忧国内政治稳定,更不把国家发展战略涵盖其中^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国内因素在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中无关紧要。

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不仅需要对国家安全利益与目标进行切实的明确设定,对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进行恰当的明确判断,并对旨在消除安全威胁、维护安全利益的战略手段进行可行的准确设计,而且还必须使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威胁的认知和战略手段的设计之间实现有机结合。而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威胁的认知和战略手段的设计,都既离不开一国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与认知,也不离开该国国内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可能只是在于美国制定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独特机理。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形成的逻辑机理

依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权力的分配”,一国的国际战略主要是由“国际权力分配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威胁格局的变化”决定的。^②虽然结构现实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国内政治对国家外交战略的影响,^③但是他们倾向于把所有国家都看作“同类单位”,把国内政治看作一个“黑匣子”,而不是看作塑造国家对外战略的

① 王缉思对中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不同之处作了极为精彩的分析。王缉思:“序”,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第1—5页。

②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 Y.: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100—101;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7—8, p. 239.

③ 例如, Kenneth Waltz 曾从国内政治结构的角度对英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差异做过分析。Kenneth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Mass.: Little Brown, 1967.

基本变量。^①与此不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一国的国际行为并不完全是由国际环境决定的,国内政治对国际战略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或抹杀。^②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认为,国家身份的变化、国家战略文化的变化,决定国家如何制定和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③但是,不论自由主义范式,还是建构主义范式,也都没能从理论上在国内变量与国际变量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联系。

迄今,只有现实主义阵营中致力于发展外交政策理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支对国家行为的国内动因作过深入的探索。该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内部及两个层次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它并不否认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的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它同时强调,国内因素也对外交政策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④国际政治历来是国内政治的反映和延伸,“国际关系的根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植根于并塑造于国内事务”。^⑤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曾经指出:“好的外交政策理论应该首先回答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因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强有力的一般性特征是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但是要理解国家如何对外部环境进行解读和回应,还需要分析体系因素是如何通过决策者的认知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位层次变量发挥作用的。^⑥虽然国家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地位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是处于相似地位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可能会存在很大差异,其中的原因只能从决策者的认知(未必与现实相符)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位层次变量中寻找。^⑦因此,只有将体系层次和单位层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3.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③ Edward Rhodes, “Constructing Powe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the 1890s”, in Peter Trubowitz, Emily Goldman, and Edward Rhodes, eds., *The Politics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New York,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78.

④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⑤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March 2002, pp. 1—9.

⑥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77—198.

⑦ Thomas Christensen 认为,历史上正是因为领导人对权力分配的误判和对进攻/防御战略的误算,欧洲各国的对外行为才出现了与当时实际权力分配状态不符的情况。Thomas Christensen, “Perceptions and Alliances in Europe, 1865—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1, Winter 1997, pp. 65—97.

次的变量结合起来,才可能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不同对外政策和战略给出合理的解释。^①

研究美国的国际行为和对外战略,仅仅从国际权力分配的角度进行是明显不够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战略是由诸多国内外因素合力促成的。不深入考察美国国内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并进而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很难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形成、调整与演变形成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政策和思想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从美国国内寻找”。“然而在我们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②对美国霸权的研究如此,对美国外交和战略的研究也是如此。

而且,在对美国国际战略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采取一种零和立场,把美国大战略要么看作国际压力促成的,要么看作国内集团利益、文化或身份决定的。实际上,任何长期观察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大战略是由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的,因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是紧密相关的。^③但把所有这些因素罗列一个清单,不论这个清单多么完整和全面,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美国大战略的脉动。问题在于,这些国内外因素是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的,它们是如何彼此关联并互动的,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成因果关系的。^④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杜埃克(Colin Dueck)在评论几本研究美国大战略的新著时指出:“这些新著大多没能以一种理论上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模式,未来的研究需要将政策、历史与理论——包括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因果变量——结合起来,以提出一个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更具预见性的关于美国大战略的变革模式。”^⑤他的评论不仅击中了

① William Wohlforth 认为,冷战期间美苏领导人对两国相对权力地位的认知变化影响了他们的战略调整。William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91—129.

②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有关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关联性的研究综述,请参见 Bruce Russett and Thomas Graham: “Public Opin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 Mari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pp. 239—258.

④ 美国学者 Robert Putnam 用“双层博弈”模型分析了国家外交与国内政治的互动,颇具启发意义。请参见 Robert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 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pp. 427—460。另请参见 Michael Desch, “Culture Clash: 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Ideas in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41—170。

⑤ Colin Dueck, “New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4, Spring 2004, pp. 197—216.

现有研究的不足,而且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困惑及应该努力的方向。

笔者并不奢望在本书中解决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也不奢望描绘一幅清晰准确的关于美国国际战略国内根源的全景图,而是试图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提出一些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变量,并对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一些基本假说,以期对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在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因素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是三个最重要的变量。自建国以来,美国精英决策层就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理念辩论,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应该用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指导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关于国际战略指导原则的辩论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实际制定与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政党政治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国会是不同党派之间斗争或合作的重要舞台,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力量对比不仅决定政府外交决策的成败,甚至影响政府战略决策的基本取向。^①美国又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多元社会,不同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差别,而且还存在着多样化的观念分歧。这些分歧和差别形成彼此竞争的民意取向,并进而左右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与调整。^②美国民意具有鲜明的“地方主义”(sectionalism)特色,尽管美国国会议员是民众的代表,但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与国会政党斗争并不完全一致。^③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民意取向的影响力相比理念辩论和政党斗争虽然具有间接性,但却更为深远,是任何一届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都不可等闲视之的。

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国内因素还有很多,如利益集团、媒体、宗教等。但是,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变量,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社会三个最重要的不同侧面:政府、国会和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其他国内因素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制约作用都需要借由这三个主要变量

① 很多美国学者早就认识到,党派之争常常使美国难以形成“长期稳定并普遍接受的外交政策”。请参见 Walter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Atlantic-Little, Brown, 1943。

② 相关的全面分析,请参见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③ Michael Lind, “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123—142。